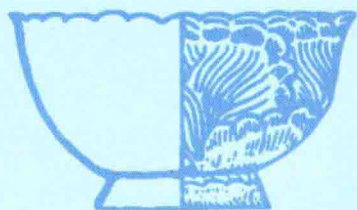


■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宋明广西海上陶瓷之路研究

吴小凤◎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序



记得2008年7月的一天，吴小凤到广西博物馆找我，问我见过《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这本书吗，我说我在30年前看过此书，我们单位的资料室收藏有这本书。她听说后兴奋得跳了起来，迫不及待地要看到这本书，说她找这本书已有好几年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是新加坡学者韩槐准先生所著，1963年由新加坡青年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奇书，大陆收藏不多，在广西估计仅广西博物馆收藏一本，系韩先生所赠阅书，知者甚少。30年前我因要参加中国古外销陶瓷学术研讨会，撰写《广西宋代窑瓷的对外贸易》论文时偶然看到此书，在我之前仅有一人借阅记录。我感到惊奇的是，吴小



凤如何知道我们单位收藏有此书？更令我由衷钦佩的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竟然还有如此执著学术研究的女士。后来吴小凤告诉我，她正在撰写“宋明广西海上陶瓷之路研究”一书，至此我才明白她苦苦寻找此书的目的。大凡研究海上陶瓷之路，此书是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若是研究海上陶瓷之路者不知有此书，自然也就是孤陋寡闻之辈了。两年后的虎年春节前夕，吴小凤将“宋明广西海上陶瓷之路研究”书稿送到我手中，并嘱写序，我欣然答应，因为这是她苦心六年研究之作，为她的学术精神所感动，却之不敬，当然也有先睹为快的心绪。读了她的书稿，发现著者不但苦苦寻找《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而在其他资料收集方面也有同此执著精神，书稿中论据、论证总是给人翔实可信的印象。

《宋明广西海上陶瓷之路研究》共分六章十九节，第一章是绪论，第二、三章是广西陶瓷考古发现情况，第四章是环北部湾古港口的考证，第五、六章是广西陶瓷的对外贸易。全书脉络清晰，“海上陶瓷之路”主题贯穿始终。总观全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将现有的考古材料用活了。研究广西海上陶瓷之路，考古发现是主要依据。我是学考古学出身的，长期以来受到考古界的地层学与类型学模式影响，固定了思维，凡发掘一个文化遗址，只需

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来研究地层关系和用器物排队的方法对出土文物分型分式，从中推断遗址的早、中、晚期年代，便算达到发掘目的了。因此，考古学的文章比较枯燥无味，往往是只见物不见人。著者不是学考古出身，但书中收集广西陶瓷考古发现的资料非常全面和详细，行文所用术语也很专业。更重要的是，书中将广西陶瓷考古发现的地点划分成若干个文化区域，总结和阐述了广西古代陶瓷生产的质和量及其外向型特征，另外论述了广西航运网络与区域陶瓷文化的关系及广西陶瓷生产与“海上陶瓷之路”的关系。这就突破了考古学见物不见人的框框，将死的古物用活了。

其二，翔实地考证了广西出海港口。书中将合浦、钦州、冠头岭、防城四个港口列为广西古代陶瓷外销的主要港口，合浦、钦州、防城虽然是人们较熟悉的港口，但大多是近现代的概念，宋明时期如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的，知者不多。著者在书中将上述港口对外贸易发生、发展历程阐述得非常清晰。冠头岭是古外销陶瓷出海口，观点很新颖。著者认为冠头岭是廉州合浦的重要支港，宋明时期冠头岭的海外贸易就非常繁忙，这里是天然的避风良港，从冠头岭起航，仅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到达交趾的东府（今越南海防市）。书中认为冠头岭不但是天然良港，还是宋明时期造船业发达的港口，这里生



长众多优质木材，可造优质的船只。考证有依有据，并非虚言。

其三，论证了广西出海港口与广州市舶司的关系。海上陶瓷之路属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范畴，海上丝绸之路中心港口有从西向东移的历史过程。我对一些媒体说过，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可用3、3、2三个数字说明：第一个数是3个海港，分别是合浦（包括徐闻、日南）、广州、泉州。第二个数是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汉至南朝时期，出海港口中心在合浦。汉武帝时，就有汉朝使节从合浦港出发，向南再向西，直到斯里兰卡才返回，这在《汉书》中有详细的记载。第二阶段是唐朝至北宋时期，出海港口中心在广州。第三阶段是南宋至元朝时期，出海港口中心在泉州。第三个数是2种商品，一种是丝绸，另一种是陶瓷器。汉代合浦港的中国商人主要是用丝绸与外商交易。广州港在唐朝时仍以丝绸为大宗，进入北宋后改用陶器为大宗与外商交易，丝绸已不多见。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广州陶瓷贸易时说：“舶船深阔多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瓷，大小相套，无少隙也。”文中已明白告诉我们，北宋时广州港的外贸商品主要是陶瓷器。泉州港则一直是以陶瓷器为主与外商交易。就此意义而言，在地域上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出口港是合浦，其他港口可叫

做海上陶瓷之路出口港。在时间上，到了宋明时期，广西的港口才成为以陶瓷为主的贸易港口。唐时对外开放，外商来货贸易，广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国家在此设市舶司，职掌检查进出船舶番货、征榷、贸易诸事，五代时废止。宋代重视海外贸易，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设市舶使，掌海上贸易。广州既设市舶司，那么广西港口的陶瓷贸易是否就此荒废了呢？书中明确指出，虽然在广州设市舶司，但运输量大，当时广州运量满足不了需要而必须再辟港口，广西环北部湾各港口是最便捷出海通道，因此，广西各港口依然是繁忙的对外贸易港口，货物主要是各地生产的陶瓷器。这一论断已得到近年水下考古发现证实，广东阳江出水的宋代“南海一号”沉船，集中了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福建瓷灶窑、福建义窑、浙江龙泉窑等中国古代名窑的制品。此船估计从广州或是福建港口起航，经阳江欲往西沿北部湾海岸线再向南洋诸国行使，结果在阳江沉没。另外，在今越南海域，近年也出水有中国宋代沉船，也都是经广西各港口出去的。这些水下考古发现说明著者的推论是有依据的。

书中还有不少新颖之见，如广西海上陶瓷之路可达目的港等论述，都很到位，很精辟，在此不展开介绍，待书付梓后读者可自行阅读。目前广西环北部湾



的经济开发是个热门话题，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该书的出版，相信能给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提供参考，就此而言，该书已远远超过它本身的学术价值，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郑超雄 虎年春节于水落斋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陶瓷：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 2

第二节 陶瓷与“陶瓷之路”研究述评 / 10

第三节 广西与海上陶瓷之路 / 17

第二章 广西的陶瓷生产 25

第一节 广西最早的陶瓷及发展历程 / 27

第二节 宋明时期广西陶瓷生产的地域分布 / 48

第三节 宋明时期广西陶瓷的质与量 / 70

第四节 宋明时期广西陶瓷生产的外向型特征 / 81

第三章 宋明时期广西的交通建设及其 与海上陶瓷之路的关系 91

第一节 宋明广西的交通建设 / 92

第二节 广西航运网络与陶瓷生产 / 100

第三节 广西陶瓷生产与海上陶瓷之路 / 106

第四章 广西海上陶瓷之路的港口 113

第一节 合浦港考 / 115

第二节 钦州港考 / 122

第三节 冠头岭港考 /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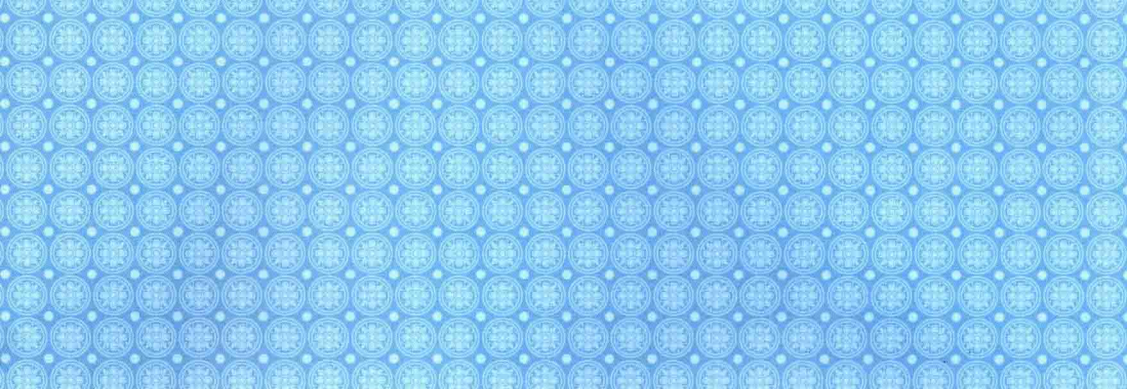
第四节 防城港考 / 135

第五章 广西海上陶瓷之路的航线及目的地
..... 141

- 第一节 广西海上陶瓷之路航线始发 / 142
- 第二节 广西海上陶瓷之路可达目的港 / 147

第六章 朝贡、出使贸易与陶瓷外销 155

- 第一节 东南亚诸国的朝贡贸易 / 157
- 第二节 对东南亚的出使贸易 / 161
- 第三节 陶瓷对东南亚的外销贸易 / 167



结 语	171
主要参考文献	179
后 记	183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陶瓷：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陶瓷之为器，实际上是陶与瓷两个品种，是同一产品链上的两个阶段，陶的创造在先，瓷在陶的基础上演进发展而成，陶是瓷之初级产品，人类社会有了陶才有瓷。初级陶器虽然粗陋，但却是人类一个极其重要的创造，可以说这是人类从蛮荒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的标志。

人类在生活中发现了地球上还可以用一种粘土，经过淘洗和上水，就可以捻成器形，加工烧制就可以成为器具，这就创造了陶器。陶器的出现是世界性的，许多国家民族先后都制作了陶器。一般来说，我国最早的陶器制作，经过碳14的测定，时间大都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至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陶器是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掘出来的陶片，距今大约有14000年，即公元前12000年。也就是说，在14000年前，中华民族就创造了陶器。从时间上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民族之一。

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生产生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陶器发明之前，人类没有盛物的器具，特别是盛食物的器具，生活上还属于原始蛮荒时代。陶器的发明，改善了生活条件，提高了生活质量。陶器的发明使人类逐步摆脱蛮荒状态，一般都是同新石器时代相一致。解放后的考古发掘，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域，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每个文化遗存，都或多或少出土了陶器或陶片。黄河上游的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文化、广河县齐家文化，中游的河南仰韶文化，下游的山东章丘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上游的四川省巫山大溪镇的大溪文化，中游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文化，下游浙江省余杭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也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片。在属仰韶文化的陕西半坡文化遗存中，还发现了6座陶窑。这些说明了新石器时期在我国幅员广阔的地域上，制陶业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分布于广大地域的文化遗存中，陶器的质量逐步提高，从比较粗糙的夹沙（粗沙或细沙）的灰陶、红陶，发展到新石器晚期比较细致的彩陶、黑陶、白陶、橙黄陶及彩绘陶。从制作来说，从手制到慢轮修整，到快轮成型，制作工艺也在实践中提高。陶器与艺术的结合，生产水平、艺术价值都不断提高。及至后来除了生活用陶，还生产了许多工艺品，丰富了人的生活。令世人惊叹的秦始皇的兵马俑陶塑群，气魄之宏大，唐三彩之瑰丽多姿，紫砂的雅致优美，都是陶器制作的极品。

至于瓷器，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现在学术界都比较一致的认为我国瓷器是在商代发明的，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瓷器的发明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制作陶器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陶器是用普通的带黏性的泥土——陶土作胎，以700~900℃的温度烧制而成；而瓷器则是用瓷石、高岭土等混合瓷土作胎，以1300℃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瓷要求的温度高，还要求瓷土含多种金属原素。1965年河南郑州市发掘商代墓葬，出土了一个完整的大口尊，还有不少的原始瓷片，是原始瓷产生年代的佐证。商代墓葬中出土的原始瓷尊，带青色釉，古朴青亮，细致紧密，声音清脆，代表了原始瓷的风格和水平。商代的瓷器为青瓷，在瓷土胎上施以釉，整个器物形成一层青绿色，光亮可爱。瓷器出现之后，无数的制瓷工匠艺人在制造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发明。它对人类发展产生的影响，可以同中华民族四大发明——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相媲美，特别是在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人的美感能力，启发人的创造力、人的意识、人的精神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更是如此。瓷器发明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影响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器物和高雅艺术鉴赏作品。

瓷器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朝代都不断在技术上探索创新，在艺术上刻意追求，特别是同绘画、书法结合，更使陶瓷艺术百花齐放，丰丽多姿，各具风采。到了唐代，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达的促进下，唐代瓷器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著名瓷窑，生产了许多名窑作品。如河南的密县窑、山东的鲁山窑、湖南的长沙窑、江西的洪州窑、河北的邢窑、浙江的婺窑等，尤为重要是浙江越窑。越窑在上虞、绍兴、宁波、萧山等地均分布有瓷窑，生产的青瓷最为有名，世称为“秘色瓷”，专供宫廷所用，是唐代质地最优

美的名瓷。秘色瓷质地细腻、釉色晶莹似玉，是瓷中极品。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的高峰时期，瓷窑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有五大名窑、八大窑系。五大名窑是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八大窑系是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龙泉窑系、越窑系、景德镇窑系、建窑系。各地瓷窑造型上种类繁多，质量精益求精，釉色色彩丰富，绮丽缤纷，加上窑变色彩，更加美不胜收。而瓷器的纹饰，题材丰富，艺术性很高，丰富了瓷器的文化内涵，各地的瓷窑，各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宋代瓷器除了众多的日用瓷器，还发展了瓷塑及观赏性瓷品，不仅丰富了瓷器的品种，而且把陶瓷提升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陶瓷工艺也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能力、艺术创造能力和审美情操。定窑瓷品的典雅清丽，官窑的富丽堂皇，汝窑的淡雅精致，哥窑的古朴天然，钧窑的华丽鲜艳，都展现了各自的风姿，真可谓美轮美奂，颇有“此品只应天上有”的浩叹。

元代虽然只有97年，是少数民族主政的时代，但是它在陶瓷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要时期。它的贡献在于创造了青花瓷和釉里红瓷。青花瓷白底蓝花，明亮幽雅；釉里红瓷青花与红色花纹相间，色泽鲜艳。元代把景德镇作为重点扶持的制瓷地方，至元十五年（1278）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瓷局”作为管理瓷业的行政机构，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发展，为明代景德镇形成制瓷中心打下了基础。明代洪武二年在景德镇建立御器厂，专门为宫廷生产瓷器，是为明代的官窑。除了官窑，景德镇还有大量的民窑。官窑的瓷品要求严格，所以官窑瓷品质量很高，挑选入宫的瓷器，大都是百里挑一。明朝各代又视当朝皇



帝的爱好，生产不同风格的瓷品。永乐甜白、翠青，宣德的祭红、宝石红、霁青，成化的斗彩，弘治的娇黄，正德的素三彩、孔雀绿，嘉靖的青釉、瓜皮绿，万历的青花五彩等，这些瓷器确实是精彩绝伦，无以伦比。据记载，御器厂所产瓷器，挑选后落选的瓷品，要打碎深埋，不得流落民间，使得这些精品价值更高，更具神秘色彩。

明代的民窑在社会需求和出口需求的拉动及官窑带动下，产量也很大，质量逐步提高，产出了不少精品，现在各地博物馆和国外的博物馆都收藏有许多民窑的瓷品。这些民窑产品也十分精美，有实用瓷，也有陈设瓷，数量很大，既供应国内市场，也有很大数量的瓷器出口国外。清王朝开国之初，派内府官员为瓷业督导，发展陶瓷业。清朝瓷业承传明代的格局，官窑民窑两条线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康、雍、乾三朝，瓷业发展又到了一个高峰时期。这时期瓷器在色彩上、瓷胎的质量上、瓷器的种类上、瓷器的艺术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又一个高峰，某些方面堪与宋代媲美。嘉庆之后，瓷业开始了下滑的态势，但作为瓷都的景德镇，仍保持着繁荣的景象，当然已非昔日的辉煌了。

中国陶瓷的发明，对世界文明进步是伟大的贡献，尤其是精美的瓷器，为世界各地人民所倾倒。中国陶瓷很早就运销国外，并对这些国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考证，中国瓷器至少南北朝时期就有不少以各种方式输送到国外，到唐代则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出口商品。宋元时期继续扩大陶瓷的出口，在数量乃至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唐代的规模。特别是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携带了许多陶瓷产品到西洋各国，扩大了中国陶瓷的影响，使西洋各国、东非各国、东